

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省

胡昌智 前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前言

今年是二戰結束第 70 年。德國在二戰後的 70 年裡經歷了國家主權方面戲劇性的變化。從戰前統一的國家墜入 40 年之久的分裂與敵對狀態，1989 年兩德卻又意外的統一起來。同樣戲劇性的變化也發生在它的政治文化方面。一個曾是軍國主義色彩，充滿法西斯式民族主義的國家，明顯地在過去 70 年中蛻變成為講人權而且有多元文化內涵的民主國家。這兩方面的變化，事實上是彼此相關聯的。

今天只要是略為熟悉德國史的人們，面對一個強大但並非強權獨行的德國，應該都會感嘆歷史發展的曲折路程竟是如此的令人難以捉摸。兩百年前，19 世紀初期，在德意志各邦國裡的知識菁英們早已嚮往著英法式的市民思想，當時各邦國內充滿著自由主義的精神。他們團結在一起推動著蓬勃的德意志建國運動。他們草擬憲法，將自由與人權安置在未來國家運作的大方針中。然而，這個充滿自由主義精神的建國運動卻不幸在 1848 年澈底失敗。20 年後，土地貴族出身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以戰爭的方式完成建立民族國家統一的大業。舉國在歡慶這個遲來的民族國家時，他們開始沉醉在對軍國主義的崇拜中。未能開花結果的德國自由主義自此完全失去了滋潤它的土壤。歡欣之中，誰能夠預見這樣輝煌的建國，卻讓德意志民族走上歷史發展可怕的歧途？事實上當時政治

哲學家樂觀地堅信德意志民族有異於法蘭西及英格蘭，不需要暴民革命。德意志建國所展開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父權式政府對人民的關愛與訓誡、軍事化高效率、高素質的官僚行政，培養著絕對守法與信服官廳的人民。舉國上下相信國家是美德的化身，它是具有民族文化使命的組織。像英法哲學裡視國家為「必要之惡」、要人民隨時監督替他們執掌國家機器官員，這樣的思想離建國後德國的政治文化非常地遙遠。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並沒有反省自己建國以來的歷史。相反的，在一戰後威瑪共和國時期裡，廣泛流傳著戰敗是受了國內猶太人的暗算，而戰爭的原因只是德國為了與先進的英法爭平等。二戰後德國的政治文化與一戰後卻截然不同，思想的氛圍中充斥著對自我的懷疑與羞愧。「我們為什麼會一而再的釀出大禍？」「德意志民族的基本價值有問題嗎？」一般人都知道德國在二戰後有豐富的歷史反省，那是沒錯的，但是我們該進一步知道他們反省了些什麼？「民族國家」這個自 19 世紀以來讓歐洲、甚至全世界，風雲變色災難四起的歷史現象，在戰後德國人心目中究竟具有什麼意義？德意志的民族國家 1871 年經由俾斯麥一手促成，歷經威廉帝國、到納粹德國 1945 年的崩潰，這段強烈民族主義的國史在戰後的 70 年裡是怎樣被看待？尤其 1933 年到 1945 年最後 12 年的納粹政權，人們如何瞭解它？納粹德國出現的原因他們認為是什

麼？

我們知道戰後 70 年裡德國人對歷史的反省不是一成不變，隨著戰後政治社會的變遷，他們的歷史反省呈現出清楚的階段。本文將戰後 70 年分為四個階段，依序說明戰後德國各界對建國以來的歷史感受。第一階段：1945 年德國投降，英美法蘇 4 國盟軍分區占領全德國。不到 5 年，在冷戰的序幕中發展出東西德兩個分裂的國家。在 60 年代中期以前，東西德雙方的政界、學界與輿論界都很少面對納粹德國的歷史問題。一般人視這段時期為德國人歷史反省的蟄伏期。第二階段：在 60 年代後期，戰後出生的第二代成年了，學生運動掀起叛逆、質問的浪潮，配合著左派首度執政社民黨的東向政策，激發了德國第一波對納粹罪行的反省與相關歷史背景的討論。第三階段：80 年代右派的基民黨再度執政。西德在經濟成就斐然以及冷戰國際地位穩固的狀況下，學界與政界又興起了民族主義的呼聲。左派知識分子在惶恐中針對這個歷史幽靈宣戰。1986 年正式展開的「史學家論戰」，可以說是戰後德國歷史反省大爆發，左右兩派立場鮮明。論戰的主題圍繞在納粹德國與民族形象。這場論戰延續到兩德 1989 年的統一。第四階段：突如其來的兩德統一對左右兩派、對德東德西都是一項挑戰。這個階段的討論在政界與學界，都被德西的菁英主導著。他們自問，德國從 1871 年建國開始到今天，走了 120 年的歧途嗎？再統一的德國

終於回到了西歐的傳統，德意志民族也變成了「正常的」民族國家嗎？這些問題是這個階段的反省主題。

一、艾德諾的融入西方與曼乃克的回歸源頭

1949年8月西德在英美法占領軍支持之下，通過憲法成立政府。總理艾德諾在他的連續四個任期內自兼外交部長，展開強勢領導。他堅持的外交原則是「融入西方」，將西德整合在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安全體系中。在這樣的原則下，西德很快的獲得冷戰中西方盟國的信任。1955年英美法撤出德國占領區，西德已獲得絕大部分的國家主權。但是同時，艾德諾與東歐集團對抗的政策，強化了兩德的分裂，尤其是1952年他拒絕了史達林兩德統一的建議。批評者強調他分裂民族的證據，在檔案中處處可尋。

美軍在1945年解放納粹集中營時，拍攝了許多紀錄片。在當時的西方占領區內，美軍於城鄉之間巡迴播放這些影片，獲得震撼的效果。民眾在被安排集體「觀賞」教育片時，許多人首度看到真相，他們痛哭失聲或閉眼不忍續看。然而，納粹罪行並非當時德國媒體以及輿論的主題。當時很少有公開言論認為俄國人、波蘭人或猶太人是戰爭受害人。當時德國人認為自己就是戰爭受害者，原因有好幾重：第一，盟軍戰爭後

期對全德國各大中型城市展開轟炸，甚至有所謂的「精神轟炸」，它要摧毀德國民間的士氣，受害者是平民。戰後十餘年間常見在廢墟瓦礫中一磚一瓦整理家園的「瓦礫婦女」（Trümmerfrau），她們的形象讓人認為德國是戰爭的受害者。第二，戰後德國國土縮小，奧得河與奈瑟河以東，原來東普魯士的廣大地區，依和約割讓給波蘭。當地1,200萬德國居民被迫遷離。這眾多的離鄉流民（Vertriebene）遷入東西德占領區，他們帶來的社會、經濟、心理創傷等問題，讓德國人認為他們是戰爭的受害者。第三，艾德諾政府在1950年將8萬名滯留在蘇聯的德軍贖回。年輕但身心極度受創的軍人在社會中給德國人民切身的印象，它讓德國人民自然地認為自己是戰爭受害者。

德國戰後的15年，根據史提芬·貝格（Stefen Berger）的問卷研究顯示，德國一般人並沒有明顯的罪惡感。政界、輿論界也沒有展開對納粹罪行的反省。倒是學術界這時候有兩位史學家著書表達錐心之痛。當時84歲的唯心史家曼乃克（Friedrich Meinecke）1946年出版《德意志的災難》以及政治史家瑞特（Gerhard Ritter）1956年出版《德意志的問題》。

曼乃克認為科技的發展、群眾政治力量的興起以及工商慾望的主宰等幾個大趨勢，是這場災難的歷史根源，而這些大趨勢都根本埋伏在西歐的啟蒙思想中。在書中，他屢次引述布爾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對

現代文明悲觀的論點，支持這樣的看法。曼乃克痛心的指出，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正是這些大趨勢帶來的結果。他的反省最後再集中在希特勒個人因素上。希特勒的自大與愚昧，將「德意志族人」帶往滅亡。曼乃克借用第三帝國用在藝術上打擊異己的術語——「不倫不類的」（*entartet*，或譯為「變質的」），他說希特勒正是將德意志精神「不倫不類化」（*Entartung*）。那麼，德國當下在「外來政權」（指盟軍）統治之下，德國族人該何以自處呢？1946年他在書中自問自答地說，族人該踏著俾斯麥以來的廢墟，回到歌德所代表的原初德意志的純淨之中。

1949年歌德200週年冥誕，西德擴大慶祝，正合曼乃克將德國歷史「去現代化」的意向，同時，紀念歌德也是當時德國人心理上對抗撲天蓋地的美國教育的一種回應。不論如何，我們看到老邁唯心大師反省的限度：一方面將德國挑起戰禍的問題普遍化，看成西方近代文明的問題，同時又將它個人化，歸之於希特勒一人。他對現代性的斥拒，對「異邦的」啟蒙的思想排斥，對德國的「本質」的信仰，都呈現著他反省的限度。

中生代史家瑞特的《德意志的問題》是政治史的作品，檢視路德以來的普魯士精神。他仍堅信德國的中歐地理位置所引發出的長期政治信念：德國應該有一套異於西歐的政治理念，同時該相信有自己的歷史

發展途徑，不宜遵循英法國家的舊途。他不懷疑德國該有所謂的「獨特途徑」（*Sonderweg*），而希特勒的崛起與「獨特途徑」意識型態無關。希特勒把德意志文化國家當成獵物，對他而言是樁神秘的意外。意外崛起的希特勒帝國異化了德意志本質。瑞特的反省沒有曼乃克的精神深度，提出的解釋更是陷入在對俾斯麥以來體制的信仰中。

二、布蘭德下跪與費雪的歷史新論

60年代後期西德逐漸跳脫出艾德諾的強勢政治領導。戰後成長的新一代帶起蓬勃的學生運動，反抗權威，要求更多的寬容、多元與自由。在這樣的氛圍下，1969年保守派的基民黨結束了20年的執政。新上任的社民黨總理布蘭德（Willi Brandt）展開對東歐友善的新外交政策。原先艾德諾是以敵對與忽視的態度面對整個東歐集團，對納粹德國在波蘭、俄國以及東歐其他國家的巨大罪行，沒有任何補償與賠款協議。布蘭德則積極展開與東歐國家尋求和解的對話。他的「東向政策」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他在1970年8月訪問波蘭時，在世界媒體前向華沙猶太人禁區紀念碑下跪。他代表了西德人民替納粹德國的罪行悔罪與道歉，這個舉動也代表了戰後的新德國，打破了將近百年以來德國人對斯拉夫民族的歧視與仇視傳

統。

在 60 年代裡，納粹暴行逐漸在西德媒體裡出現，並且收視率不斷增加。首先，在 1961 年，納粹一位逃亡的中級頭目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情報人員在阿根廷綁架並偷渡回耶路撒冷審判。西德輿論非常關注這場極不尋常的以色列政治審判秀。同時，西德經歷多年的蒐證，也終於在 1963 年對奧斯維茲集中營的各級幹部與工作人員提出告訴。這項審判在法蘭克福市舉行，從 1963 年到 1968 年開庭百餘次。媒體的密集報導終於讓西德人民對納粹有了新認識。

在學術界裡，漢堡大學歷史教授費雪（Fritz Fischer）於 1969 年出版《為虛幻而戰》，在史學界裡投下一顆歷史反省的震撼炸彈。費雪以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戰前德意志帝國社會各種菁英集團的利益。這些集團包括：東易北河的傳統大地主以及克魯伯、提玉森、佛格勒等重工業財團，土地貴族出身的軍官階級、天主教，以及文官階層等。這些菁英集團因為經濟與社會利益，他們都支持威廉德國領土東向擴張的政策，政治與社會菁英的利益相互結合。甚至，費雪認為帝國政府受這些利益集團的挾持而訂定東向侵略政策，形成德國在一戰之前長期追求中歐霸權地位的國策。費雪以此論點解釋一戰的爆發。同時，他論述反猶政策與東侵略奪「生存空間」等納粹德國的政策，都不是希特勒發明的，而是根本早已植

根在希特勒之前半世紀的社會利益集團中。費雪後來將他的這個論點以標題方式提出，他說：「希特勒不是意外脫軌。」（Hitler ist kein Betriebsunfall.）費雪的論點完全推翻了曼乃克與瑞特視希特勒為德國歷史異象的看法。他擺脫了將戰禍歸罪希特勒個人的論述，他也拋棄替德意志民族脫罪的歷史駝鳥心態。

在布蘭德的東向政策與納粹審判的氛圍中，費雪透過社會史與經濟史的新研究取向，將歷史的批判上推到建國初期，他強調了納粹德國在整個德國歷史中的延續性與不可避免性。費雪的研究摧毀了唯心史學強調德意志精神那種「本質論」的歷史研究舊取向。費雪出書後，引起史學界的論戰：一場社會科學觀點與方法，針對傳統政治思想史以詮釋文字為主要的研究方法的論戰。事實上論戰延續至今，剛過世的維勒（Hans-Ulrich Wehler）以及柯卡（Jürgen Kocka）延續著費雪開啟的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傳統，他們建立起的學派在 80 年代之後不斷修正，同時也證實了費雪在 60 年代裡提出的許多論點。德國戰後的歷史反省深入到了社會經濟的層面，歷史反省與史學方法的更新相互結合在一起，齊頭並進。

三、哈伯馬斯與民族主義的「四人幫」

70 年代後期，在經濟有了卓越成就

以及在政治長期穩定的情況下，西德保守派陣營裡出現各種要求正面歷史解釋的呼聲。1979年巴伐利亞邦右派的基社黨黨魁史特勞茲（Josef Strauss）競選時說：「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長期忍受沒有歷史認同的處境。」1982年重新執政的基民黨柯爾總理，誓言要在戰後40年的西德展開一個「精神與道德上的大轉向」，他要的是一個沒有罪惡感的民族認同，以及有光榮事蹟的民族歷史。1985年歐洲終戰40週年，美國總統雷根在柯爾總理陪同下在德國畢特堡（Bitburg）軍人墓園獻花。該墓園葬有44名納粹禁衛軍。這個舉動有將二戰的過去一筆勾消的象徵意義。它引起了大西洋兩岸左派人士的不安。西德左派知識分子這時最擔心的是德國民族主義的復活。事實上，柯爾總理聽從紐倫堡大學歷史學教授史提玉默（Michael Stümmer）建議，早在1983年就已經開始籌建柏林歷史博物館。他已經顯示出政府開始要塑造一個定於一尊的官廳版歷史解釋。史提玉默於1986年6月6日在《法蘭克福廣訊報》暢言，他說：「誰能夠將記憶填滿，塑造概念，詮釋過去，誰就可以在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度裡贏得未來。」史提玉默明顯的在鼓勵基民黨政府提出正面的歷史解釋，藉以占領人民「空虛的心靈」。

好辯的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忍無可忍在7月11日的《時代》週報發出戰書。他指名批判

包括史提玉默在內的4位歷史學教授，恩斯特·諾特（Ernst Nolte）、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以及希德布蘭特（Klaus Hildebrandt），所謂的「四人幫」。其中史提玉默當時兼任基民黨的康拉德·艾德諾基金會董事，而且曾當過柯爾總理的歷史顧問。他與政界關係最為密切，歷史與現實政治的關係他表達的最直接。他在論戰前曾說：「沒有歷史的自我認識，就沒有內政與外交行動的可信性。」然而，哈伯馬斯的戰書更主要是針對提出具體歷史解釋的諾特與希爾格魯伯，而不是學政兩棲的思想軍師史提玉默。

希爾格魯伯1986年將發表過的論文集結成小書《兩種沉淪》。他的論點是東線戰爭是意識型態之戰，它與西線對英法之戰截然不同，而意識型態之殊死戰完全是由希特勒主導的。哈伯馬斯從納粹整個利益團體的角度，批判該書所做的東西線戰役背後思想的區分，他更不相信希特勒個人塑造出意識型態。

「四人幫」中真正具有學術震撼力的是諾特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他是哈伯馬斯批判的焦點。諾特沿襲韋伯類型化（Typologiesierung）的研究方法，歸納出20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幾項特質：充分使用暴力、極度的宣傳、操弄民族主義、反自由主義以及反共產主義。他認為納粹所代表的法西斯是對共產主義「過度的」反動。1917年10月革命後，從列寧到史達林一直持續

的長期大屠殺，當時的德國輿論認定這場大屠殺是「階級屠殺」，所屠殺的是資產中產階級。諾特認為，在德國中產階級面對國際布爾什維克的危機感之下，納粹順勢而起。諾特甚至在《歐洲內戰》書中認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奧斯維茲集中營是模仿布爾什維克的古拉格（Gulag）。不只是模仿，他說兩者根本就具有因果關聯（Kausale Nexus），納粹的屠殺猶太人是被史達林的古拉格帶動起來的。在他的看法中，奧斯維茲是德國中產階級在猶太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雙重壓力下反擊行為的產物。諾特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相對化了納粹罪行的歷史，否定了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單一性（Singularität），也使德意志民族，尤其是納粹德國歷史，在冷戰中獲得正面的意義。納粹成了對抗共產黨的先鋒，而冷戰可以說是納粹失敗後，納粹所開啟的戰役之延續。

哈伯馬斯的立場很明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認同，他認為該以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為基礎來建立，歷史不是用來建立民族認同的工具。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他要澈底的批判德國反對西方啟蒙傳統的一切思想與制度，並認為德國兩百年來所走過的歷史全是歧途，必須「全盤西化」。支持他的史學家著名的有漢斯·孟森（Hans Mommsen）、沃福岡·孟森（Wolfgang Mommsen）、維勒（H.-U. Wehler）。其中，繼承費雪從事威廉帝國社會史研究的畢勒斐大學的維勒最為積極。

這次論戰共有七十多名史學家參與，論戰持續三年多，到東西德統一為止。「史學家論戰」其實是一場政治論戰，雙方攻擊性的文章完全不發表於學術期刊或專業文集。右派的言論多刊載於《法蘭克福廣訊報》、《世界日報》，而左派言論則刊登於《時代》週報或《明鏡》週刊，報界、雜誌界的壁壘分明。同時，參與論戰的學者許多身兼政黨職務，漢斯·孟森當時擔任社民黨歷史委員會召集人，史提玉默則是基民黨基金會董事。事後學界回顧此次論戰，直截了當的認為，論戰沒有產生出學術上的新知識。

四、東西德統一與民族正常化

80年代在西德政黨、輿論與學界裡，左右派陣營分明。相一致的是，他們都沒有預見東西德的統一，事實上他們也都不期望統一。即使西德政界人士因應政治正確的準則常提統一，但眾人皆知那是「沒有實際需求的嘴邊話」（Bekennnis ohne Bedürfnis）。（註1）但是戈巴契夫的「透明與改組」讓整個蘇聯共黨體制瓦解，德國的統一就這樣意外地「從天上掉進了德國人的懷裡」（史提玉默名句）。

配合著國際協商的急迫性，柯爾政府也在兩德內部展開急速的統一措施。哈伯馬斯高唱兩德應該在一個新憲法架構下統一，他認為急速強行統一將拖緩西德西化的步調與能力。一向支持布蘭德的諾貝爾文學獎葛

拉思（Günther Grass）認為，一個有奧斯維茲歷史的民族根本沒有統一的權利。左派社民黨領袖拉芳田（Oscar Lafonten）認為，急速統一將替雙方帶來經濟上的不利後果。這些學界、政界、輿論界的立場，顯然與時務無法銜接。事實上，當時展開的就是急速統一。它將東德完全納入西德的憲法與體制中，最具體的現象就是百分之七十三的德東地區公職與相關職務，都由西德人擔任。急速統一對德東人民而言，等於被自己同胞殖民，對西德人民而言，這是繼去除納粹思想之後，另一個去除共產社會主義意識的長期任務。兩德人民在經濟上、價值觀上、心理上的差異極大，這個危機是左右派各政黨所共見。左派社民黨前總理史密特（Helmut Schmidt）因此推動成立德意志民族基金會。右派基民黨第二號頭目「萬年王子」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更在德國論壇呼籲強化民族認同回歸民族常態，獲得企業輿論界極大回應。左右兩派在民族認同的這個議題上，已經沒有統一前的尖銳對立。彌補兩德差異的實務，拉近了雙方的距離。

1996年4月德文版《希特勒的那些順從的劊子手們》出版，作者哈佛大學教授葛哈根（Daniel Goldhagen）解釋大屠殺為什麼會在德國發生，畢竟反猶主義全歐都有，而且於法國與俄國更行昭著。他提出三點原因：（一）德國有當時最極端的政府；（二）全面的戰爭迫使德國政府採取激烈措施；以及（三）最重要的是反猶主義深植德

國一般人心中，這是他全書的重點。葛哈根利用路德維希堡（Ludwigburg）地區納粹罪行檔案，研究該地警察單位人員及居民日常生活與心態。

該書德文本出版後數週內賣出8萬冊，極為搶手。同時，9月與10月作者本人在德國各城市的巡迴演講與討論，幾乎場場爆滿。1997年葛哈根獲頒民主獎，哈伯馬斯應邀致詞，稱讚該書激發統一後德國人對納粹歷史的反省。相形之下，史學界對該書評價不佳。終身致力於納粹德國研究的伏艾（Nobert Frei）直言，該書僅提出德國人有「集體罪行」的舊論點，不具新意，在媒體軒然聲中，他斷言該書沒有引起論戰的條件。魯爾大學的漢斯·孟森指出該書兩點基本問題：第一，作者沒有參考近十年來的研究成果；第二，作者對所使用檔案供詞中狡黠的文句沒有讀懂。孟森的評語可以說完全否決了該書的學術價值。熟悉路德維希堡納粹罪行檔案的英國史家柏恩（Ruth Bettina Birn）也認為，葛哈根扭曲檔案原意「編織幻象」，並指出作者論述常用虛擬詞，敘述的方式不是理性的歷史解釋，而是感性的煽情。（註2）

《希特勒的那些順從的劊子手們》造成熱潮，它顯示出統一後的德國，仍然非常關心半世紀前納粹德國的罪行。2009年葛哈根又出版《比戰爭更可怕：滅族的緣起》，書中作者再度強調德意志民族「集體罪行」的論點，並建議懸賞緝拿納粹人犯。該書未

再引起輿論的注意。1996 / 1997 年的葛哈根熱潮只能視為德國民族走向正常化的一部分，沒有迴避歷史的批判，但也沒有盲目的接受批判。

1998 年「民族正常化」的呼聲，甚至出自一位曾經明顯屬於左派的文學家及文學批評家瓦爾色 (Michael Walser)。該年，瓦爾色獲得該年德國書商協會和平獎。10 月 11 日於法蘭克福市保羅教堂發表得獎演說。演說中他希望德意志民族有一個正常的民族認同，奧斯維茲不可以一直拿來當「道德教鞭」，納粹罪行不該被塑形化成為德國永恆之恥，(註3) 二戰既往之事，更不得被工具化作為政治勒索的手段。演講結束，全場 1,200 人起立鼓掌，(註4) 顯然積壓在眾人心裡，但卻因政治忌諱不敢說出的想法，都被瓦爾色合盤道出。統一之後，德國官方的民族主義表現的很溫和。民間除了少數新納粹的活動，一般人對民族主義也不具激情。2001 年德國重修極具軍國主義意義的普魯士軍廟，未引起左右派的騷動，普魯士第一任國王移靈波茨坦，也沒有政治遊行，相反的，這些都被「去政治化」，視為增加了柏林市觀光景點。在右派異議聲中，柏林的大屠殺紀念廣場如期完工。傳統民族主義的激情不再活躍，這也許是瓦爾色能無懼地提出「民族正常化」呼籲的原因。2015 年 5 月 8 日，德國投降 70 週年，總統高克 (Gauck) 與總理梅克爾率領全體閣員在國會舉行紀念會。議長拉梅爾特 (Lammert)

重申一個重要的基調：70 年前德國是「被解放」(Befreiung)——盟軍不是敵人是解放者，納粹德國不是祖國。(註5) 史學家溫格勒 (Hans August Winkler) ——《走向西方漫長的路途》(註6) 作者，也在紀念會應邀演講。他相信拋棄德國「特殊途徑」信念走向西方，這是戰後 70 年來德國人覺悟歷程，他同時指出面對新近發生的排外活動，一定要記取納粹教訓，讓新的民族國家裡，每一個生命都受到尊重。

結語

戰後 70 年中，曾掀起兩次歐戰的德國呈現出繽紛的記憶文化。千禧年前後的兩次「國防軍展」對德國國軍形象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項展覽顯示在戰後的德國，沒有禁忌的歷史反省是可行的，而且會被群眾所接受。為期 7 年的巡迴展，激起了正反雙方的激辯，這種記憶文化令人嚮往。1999 年德國國會決議在新首都柏林中心地帶建造大屠殺紀念廣場，紀念全歐洲被屠殺的猶太人，在紛紜的討論與攻擊中，政府堅定地將計畫完成，2005 年 5 月正式揭幕。我們認為知恥與羞愧的決心長存於紀念廣場的背後。同時，順著史家溫格勒的說法——德國戰後 70 年邁出了走向西方的步伐，我們甚至可以說，戰後 70 年的德國記憶文化，豐富了它所追求的西方的精神。

延伸閱讀書目

- Berger, Stefan, *Germany -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4.
- Fischer, Fritz,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1914*, Düsseldorf: Droste, 1969.
- Fischer, Fritz, *Hitler war kein Betriebsunfall. Aufsätze*. Droste, Düsseldorf: Droste, 1992.
- Meinecke, Friedrich,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Wiesbaden: Brockhaus, 1946.
- Ritter, Gerhard, *Das deutsche Problem. Grundfragen deutschen Staatslebens gestern und heute*. München: Oldenbourg, 1962.
- Hillgruber, Andreas, *Zweierlei Untergang: Die Zerschlag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as Ende des europäischen Judentums*. Berlin: Corso bei Siedler, 1986.
- Nolte, Ernst, *Die 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 Eine Rede, die geschrieben, aber nicht gehalten werden konnte*.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Quell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6. Juni 1986.

- Nolte, Ernst, *Der europäische Bürgerkrieg 1917-1945.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Frankfurt/M: Herbig Verlag, 1989.
- Winkler, Hans A.,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München: Beck, 2000.

【註釋】

1. 當時另外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西德政府認為東西德該是一個國家，而東德政府認為彼此根本就是兩個國家。東德人民認為東西德應該是一個民族，而西德人民認為彼此根本是兩個民族。
2. 他的評論刊於1997年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葛哈根的回覆是：要告柏恩及該雜誌。
3. 瓦爾色反對在柏林市建大屠殺紀念廣場。他形容那是：首都中心足球場大的夢魘。
4. 只有德國猶太人協會會長 Bubis 與其夫人，以及另一位人士持有異議，未起立鼓掌。
5. 二戰德國不是被擊敗，而是被解放。這個歷史解釋是魏思哲克（Weiszäcke）總統1985年定的調。
6. Hans A.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München: Beck, 2000.